

鄂州英烈

EZHOUYINGLIE

主编：湛有恒 刘法军 曹焱明



接力出版社

鄂州英烈

(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记杨学诚同志为抗击日寇奋战到生命最后一息

湛有恒

杨学诚(1915 - 1944), 又名奇山, 1915 年 8 月 8 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研子岗杨保益湾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亲杨祥和, 给地主当长工, 兄弟五人, 家境十分贫困。杨学诚幼年天资聪颖, 好学上进。因家贫无法跨入校门, 他就常常跑到私塾窗下, 偷听先生讲课, 用树枝当笔, 在地上学着写字。父母见后, 十分心疼, 决心卖掉仅有一点薄地, 送他人私塾读书。后来本家三伯杨祥华见其聪明又勤奋, 就资助他到汉口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他刻苦攻读, 品学兼优, 颇受师生赞誉。1930 年, 又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由于经济困难, 他只好白天读书, 晚上做工, 实行勤工俭学。由于学习刻苦, 各门功课名列前茅, 1934 年秋, 他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步入最高学府。

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

杨学诚同志迈进清华园, 正是国难当头。日军在侵占了我们东北三省后, 又于 1935 年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面对敌人的入侵, 国民政府步步

退让。继 1933 年《塘沽协定》后,又于 1935 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在这国家存亡、民族灭种的危机时刻,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职责……”这伟大的呼声,大大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爱国热忱。

北平进步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12 月 8 日,“学联”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举行示威游行。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杨学诚是学生中的骨干,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他高呼抗日口号,对反对派投降卖国的行径给以无情的揭露。12 月 16 日,他又参加了有 3 万多人参加的天桥集会和示威游行。

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华北农村,党通过“学联”组织了“南下宣传团”。杨学诚和李昌、于光远等都在第三团任先遣队员,负责侦察情况、选定路线、办理食宿。这次南下宣传,影响很大,鼓舞和发动了群众起来抗日。

宣传团返回北平后,他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次,清华大学召开反法西斯大会,一个汉奸跑来捣乱,打翻了会场门口写着抗日标语的灯笼,撕毁了会场标语。面对汉奸的嚣张气焰,杨学诚首先振臂而起,率领同学痛打了这个坏蛋。

1936 年 2 月 25 日,国民党出动 5000 多名军警包围清华大学,搜捕蒋南翔等同志。在这紧急关头,杨学诚冒着生命危险,率领进步同学,从军警手中将蒋南翔抢回。面对白色恐怖的政治寒流,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团体“民先”选举杨学诚等 5 名同学组成新的领导机构。1936 年 5 月,杨学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后,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清华大学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相当尖

锐,但他头脑清醒,富有演说才能,善于在各种场合有力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批驳国民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无耻滥调。斗争的实践使他成为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

1937年5月,刘少奇、彭真率领杨学诚、黄敬、李昌、林一山等到延安参加党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并亲自跟北方青年谈了话。杨学诚和李昌从不同的角度在代表会上发了言,提出了一些意见,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后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的结论部分,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

从延安回到北平后,杨学诚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他和蒋南翔一起,从事流亡学生的抗日救国工作。在离开北平前两天,他俩设法通过日军的重重岗哨返回清华园,分头将藏在那里的秘密文件烧毁。后来集合起城内部分“民先”队员,撤到天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杨学诚和蒋南翔随队南下,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流亡同学会。

9月初,作为平津流亡学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杨学诚到达武汉,在武昌三道街办了一个补习学校,建立起活动据点,并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广泛发动和团结青年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当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日军进犯的主要目标时,杨学诚和姜纪常、孙世实等同国民党省党部经过三番五次的斗争,又组成武汉第一个深入农村的救亡宣传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成立后,杨学诚任省委青委书记,不久改任青年部长,领导武汉和全省青年运动。

“就是讨饭，也要讨到一支枪！”

1938年6月，杨学诚奉调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当时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杨学诚和在鄂中工作的陶铸一起，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持在鄂中做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9年春，杨学诚任中共鄂中特委组织部长，并代理特委书记职务。1939年底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后又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他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支部的工作，重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1940年，他在小焕岭召开的鄂豫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工作报告；以后又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目前支部的严重现象》、《反对党内的中农思想》等文章；亲自派干部深入到各县具体抓支部建设，要求每个支部都要摸清党员的思想状况；他自己在那动乱的情况下，还亲自找党员谈话。鄂中党组织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能发挥坚强的核心堡垒作用，这与杨学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雍文涛于1941年5月在延安向陈云、王稼祥、蔡畅等汇报鄂豫边区党委组织工作情况时，曾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陈云听后赞扬说：“杨学诚同志在戎马倥偬中还能够找支部书记谈话，具体地一个一个了解支部党员情况，很了不起。”

杨学诚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指示，注意抓枪杆子的工作。1938年中秋节前，他在应城潘家集蔡松荣家盐棚子的炮楼上主持召开了3天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分析了鄂中的斗争形势，具体部署了应城沦陷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全党军事化，为开展游击战争而斗争”的方针。他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到一支枪。”这次会议十

分重要,对鄂中迅速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会后,他深入鄂中各地,检查督促。他给钟祥县委书记的信中就曾写道:“武汉情况紧急,要马上把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武装斗争上来,想方设法搞枪支,准备上山打游击……”钟祥县委按照杨学诚的指示,紧急行动起来,人人动手搞枪,从国民党溃败的散兵手里买,从联防队里往外拉,很快就搞到了几百支枪,为后来组建“应抗”第四支队打下了基础。

杨学诚十分重视在工人中发展武装,他同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到应城膏盐矿区宣传抗日,建立党组织。他多次到蔡松荣家,要蔡利用有利条件,组织群众购买武器,尽一切可能作好打游击的准备。蔡松荣根据特委和杨学诚的指示,以矿区的几个党员和一批积极分子为基础,很快拉起一支队伍。这就是有名的“应抗八条枪”。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这支小游击队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应城抗日游击队的中队、大队、支队,直到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团队。

李先念在《一年来鄂豫边区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我们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征途上,汇合了信阳地区共产党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同志以28支枪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和张体学同志率领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蔡松荣等同志以8支枪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陶铸也高度赞扬说:“在发动根据地的群众运动、扩大武装部队的工作上,学诚同志都有很大贡献。”

杨学诚在开辟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同敌、伪、顽展开殊死的斗争;同时,也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民

主政权的建设。1943年1月,边区党委在蒋家楼子开会,杨学诚提出:“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在1943年5月一次区党委会议上,他提出了“强化政权”的主张。他认为,加强政权建设,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充分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更好地支援军事,从而达到“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要求。会后形成为区党委文件。杨学诚是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党内他是行政公署党团书记。他同其他领导成员一道,制定了施政纲领和许多工作条例;同时健全了机构,行署下设了财、粮、司、法、文教等处,还成立了公安总局,在基本区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民主乡政权,在边沿区则让以我为主的“两面”政权或“三面”政权存在。他团结了各党派的抗日人士,努力实施各项坚持抗战、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措施,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广泛动员了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援抗日游击战争。他为边区长期坚持抗战,发展人民民主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是公款,一个也不能用!”

杨学诚对党的事业一贯忠心耿耿。他在鄂中的工作,曾得到刘少奇的高度赞扬。刘少奇说:“杨学诚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锻炼,他虽然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毛病。”

1939年6月中旬,李先念和陈少敏率新四军两个干部连到达京山养马畈,找到杨学诚,商量重新组织鄂中特委(区)党委,并根据少奇的指示,要把“应抗”一、二、三、四支队改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代理鄂中特委书记的杨学诚,态度非常明确,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需要我们打着‘应抗’的旗帜,我们就打

‘应抗’的旗帜；党需要我们打党的旗帜，我们就首先站出来，打党的旗帜！”李先念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反复指出：“杨学诚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杨学诚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可他并不满足已有的知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也抓紧点滴时间学习革命理论，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他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父亲死后，家里常靠借贷典当度日。母亲时常捎信，叫他抽空回家看看，但他为革命日夜奔忙，无暇回去。一次在去开辟鄂南的途中，他带一位连长，骑两匹马，顺路去看母亲。马背上驮着两口袋银元的部队经费，湾里有人私下议论：“这下他家有钱了。”杨学诚严肃认真地对家人说：“这是公款，一个也不能用！等将来遍地开红花，革命胜利了，我再接娘到武汉去住些时。”有一次母亲去应城看望他，诉说家里的困难，希望得到帮助。他对母亲说：“现在我们党还在开辟根据地，经费很困难，每个干部家庭有什么困难，都要靠自己解决。家里可先把房子卖掉，暂时克服困难吧。”硬是说服了母亲。

杨学诚身居高位却没有官架子，特别平易近人。平时，他经常穿一身农民衣服，裤腿扎在袜筒里，爱披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同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在丁家冲根据地初创时，他同战士一起肩靠肩、背靠背睡地铺。“八条枪”小游击队刚拉上山的时候，一天，应城的老反共头子蒋老七带着应城保安团两三百人经过丁家冲时，大家怕他趁机下毒手。杨学诚挺身而出，拿起长枪，亲自放哨，对大家鼓舞很大。

1942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边区开辟鄂南地区。8月，边区成立了鄂南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治委员。当时，

鄂南的敌顽势力很强大,形势十分险恶。面对强大的对手,杨学诚知难而进。8月1日,他与刘少卿率部渡过长江。8月2日分两路夹击,在鄂城、大冶两县交界的谈家桥、傅家山、刘仁八地区发起大的战斗,消灭破坏抗战的土顽3000多人,俘敌官兵325人。接着建立了中共大(冶)鄂(城)、武(昌)鄂(城)两个工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敌以打击,使敌伪日夜不安。他在鄂南很快打开了军事局面,在党的发展、政权建设、清匪除奸、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工作方针,应从实际出发”

1942年8月中旬,杨学诚根据鄂豫边区和五师师部的指示,在鄂城谈家桥(现属大冶)正式成立鄂皖湘赣兵团指挥部(亦称江南指挥部),刘少卿(化名江岳洪)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治委员。江南指挥部成立后,杨学诚同志在谈家桥主持召开了指挥部党委扩大会议。鄂南工委及其下属各工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分析鄂南斗争形势,制定工作方针。在讨论中,部分同志认为,我军应趁顽军败退大幕山区,日军慑于我军威力不敢轻举妄动之机,迅速进军大幕山,消灭顽军,占据大幕山有利地形,进一步扩大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立足于巩固、建设已开辟的沿江根据地,相机向大幕山进军。

杨学诚同志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与指挥部其他领导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后,在大会上作了总结。他说:我军是正义之师,正义之师必胜,士气高涨,指战员英勇善战;群众欢欣鼓舞,热诚拥护我军;顽军溃败,集结在大幕山区;敌伪见我军主力进入鄂南,其活

动也有所收敛。以上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是,我们对敌顽我三方面的情况,要有全面的了解和清醒的估计。我鄂南军队能集中作战的主力只有 1500 至 2000 人,而在鄂南的日、伪以及顽军的兵力,大于我军 10 倍至 20 倍,相比之下,敌顽占绝对优势。谈家桥地区是当前我军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距金牛、保安、铁山、大冶、刘仁八等日伪据点较近,敌伪随时可向我军进攻;距国民党顽军驻地大幕山也只有一天行程。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民党军虽然消极抗日,但抗日仍在继续,他们与日军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互相勾结、共同反共的一面,特别是地方土顽与日寇的勾结更为密切。所以,我们的工作方针,应从实际出发,抓紧当前的大好时机,利用敌顽矛盾,以迅速发动群众建设开辟新区为主,站稳脚跟,相机向大幕山区发展,逐步扩大鄂南抗日根据地。

与会同志听了总结后,一致认为学诚同志对形势的分析透彻,指导思想明确,提出的工作方针符合实际,从而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大家表示,回去要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按照会议制定的方针开展工作。后来斗争实践证明,学诚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杨学诚同志身任江南指挥部政委兼党委书记,除处理日常工作外,还就近指导大鄂工委的工作。他亲自深入大鄂工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指示大鄂工委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他同指挥部其他领导商定,从部队抽调营连干部各 1 名,抗大学员 4 名,步枪 10 支,作为发展大鄂地方武装的基础。同时指出,大鄂这支武装力量,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坚持敌后斗争,没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是不行的,要尽快地使它发展壮大起来。

在杨学诚同志亲自指导下,大鄂工委立即在指挥部驻地附近开展工作。深入发动群众,访贫问苦,动员红军家属、亲友和贫苦农民参军参战。由于这里的人民深受日、伪、顽的残酷统治和压榨,对他们深恶痛绝。经过宣传发动,群众纷纷向我们提供情报,协助我们搜查顽军溃散人员和枪支,帮助我们动员爱国青年积极报名参军。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展到拥有 50 多人(枪)的武装,组成了 1 个中队,不久又成立了大鄂抗日大队。随着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大鄂地区的群众工作、政权工作迅速发展,到敌据点附近,东到大冶县城、姜桥、马叫一带,西到茗山、杨林桥附近,北到保安、铁山地区,南抵刘仁八、毛铺附近,并在这些地区相应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还在谈家桥附近成立了农救小组,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从而使大鄂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政权日益巩固,群众工作得到全面展开。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贯彻落实杨学诚同志提出的“我们的工作方针,应从实际出发”是分不开的。

“共产党英才济济,救国重任舍彼其谁?”

大鄂地区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伪恐慌。周围据点的日军除了经常对我进行武装侦察外,还派出大批特务潜伏我军驻地刺探军情。面对这一情况,杨学诚同志多次提出加强我军的情报工作。每当大鄂工委捕捉到敌军的谍报人员,他都要亲自过问。有一次,大鄂抗日游击大队在群众的协助下捕捉到了谈家桥地区敌谍报队长毛某和成渠派来的侦探——“八大金刚”之一的纪某,杨学诚同志亲自过问,并指示大鄂工委“要严加审讯,详细了解敌、伪、顽的兵力部署、活动规律和互相勾结的情

况”。为了掌握敌军的动向,杨学诚同志多次指出:“在敌情十分复杂、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当瞎子,做聋子,要有自己的耳目。”在杨学诚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鄂南敌伪工作站。由于情报工作做得好,敌动我知,金牛、保安等据点的敌人,几次夜袭我大鄂工委活动地区的茗山、洪滨桥等几个村庄,都因我们事前有所准备,敌人连连扑空。

杨学诚同志非常重视统战工作,认真贯彻“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阶层,孤立和打击敌伪和顽固势力”的方针。他在百忙中经常抽出时间,召开各种会议,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跟进步士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召集有影响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乡保长和其他社会人士开座谈会,或登门走访,向他们宣传我党政策,争取他们抗日。

有一次,他在谈家桥地区召开的有几十位知名士绅、爱国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很精彩的演说。他首先扼要讲述了当时苏联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发展形势;接着分析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点;然后介绍了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作战的情况;着重详尽地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介绍了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以及减租减息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情况;热情赞扬了武鄂沿江地区爱国人士不惜倾家荡产,甚至以生命掩护共产党和新四军工作人员的大无畏精神。最后他强调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到会的各位先生积极参加政府工作,尽智尽力,出谋献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不把鬼子赶出国土,誓不罢休!”

与会者个个凝神聆听,杨学诚同志的讲话不时被掌声所打断,还有人发出喝彩声:“讲得好!”其中有位鬓发苍白的老先生,双目

注视着这位衣着朴素、才貌双全、不到而立之年的杨学诚同志，边听边捋须点头。杨学诚同志的话音刚落，他就抢先发了言：“杨政委今天这番话讲得好！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肝胆相照，以理服人，堪称奇才！共产党英才济济，且光明磊落，乃民族之希望，救国重任，舍彼其谁？”这充分体现了爱国人士对我党和我党干部的高度信任。

会后，杨学诚同志又亲自登门拜访了几位较有名望的爱国绅士。不久，谈家桥附近大小雷山两位著名的绅士参加了大鄂政务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不仅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而且使统战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1942年11月，敌人在谈家桥几次扫荡扑空，便先后在刘仁八、殷祖等地安下据点，妄图割断我大鄂和阳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同时，金牛日寇出动1个中队，并迫使成渠部派1个营，在谈家桥与金牛之间的纪家祠安下据点，直接威胁我谈家桥驻军司令部。与此同时，日伪在纪家祠附近村庄，经常拉夫、抽丁、抢修工事，企图长期盘踞。

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打破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阴谋，鄂南指挥部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由吴林焕副指挥长主持，指挥部参谋长熊作芳具体介绍了敌伪兵力分布及火力配备情况，提出了我军作战方案，并对我军兵力、火力布置、突破口的选择、进攻时间、指挥阵地、联系信号以及截敌退路和后勤等工作具体作了安排。作为指挥部的政委、党委书记的杨学诚，对这次战斗非常重视，听完大

家的发言后,表示对作战方案完全赞同。他说:“这个方案周密详细,既有进攻的具体部署,又有防范意外的措施,是个较全面的作战方案。”他沉思了一下,着重指出:“我们不打消耗战,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务求全歼这股敌人。”接着,他又亲自给大鄂工委布置了战斗任务,要求地方武装负责外围警戒、救护伤员,密切配合主力作战。

战斗打响后,由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日伪军远离金牛老巢,在纪家祠又立足未稳,突然遭到我大军压境、猛烈攻击,顿时惊慌失措,阵脚大乱。激战半天,伪军1个营全部被歼,日军1个中队伤亡过半,余部窜回老巢。我军大胜,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大家都说,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结果。

纪家祠战斗结束后,杨学诚同志及时分析了敌军的动向,明确指出,敌伪惨遭失败,决不甘心,会很快集中兵力对我进行报复,顽军也可能趁机捞一把——进攻谈家桥地区。在分析敌情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了应变措施。

果然不出所料,时隔几天,日伪军纠集2000余人,先后两次大规模扫荡我大鄂地区。他们以谈家桥为攻击中心进行纵横交叉搜索,妄图寻找我主力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九战区正规军一部配合顽军数千人,也趁伪军大规模扫荡谈家桥根据地之际,窜到谈家桥附近骚扰。由于我军事先有准备,敌伪顽均无所获。

“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我军连战告捷,多次粉碎了日、伪、顽军的扫荡和进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改变战术,采取分散活动的

方式,不断以小股部队偷袭我地方党政机关和抗日武装。同时,派遣奸细混入我内部进行破坏。

根据这一新的动向,杨学诚同志立即召开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大家认为,日、伪、顽相互勾结,分进合击,是大规模进攻我根据地、企图卷土重来的前奏,形势将会急剧变化。听了大家的分析,杨学诚同志当即指示各工委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要加强警戒,时刻准备战斗;机关要精简,年老体弱及女同志,要尽快转移到江北;要加强除奸工作,严格审查新近入伍人员,防止混入内奸,消除隐患。

就在这极度困难时期,国民党九战区派遣正规军一部,以廖义华土顽为先锋,窜犯我谈家桥地区。为了保存力量,杨学诚同志与江南指挥部其他领导一起,立即率主力部队转移,并指示留下的部分部队和大鄂地方武装组成大鄂指挥部,岳林任司令兼政委,李洛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战作,阻击敌军,掩护我主力部队转移。

我军主力撤回江北后,杨学诚同志率部分武装到樊湖地区。大鄂指挥部也转移到保安、铁山敌伪据点以南几公里的茗山、黄金山一带。一天中午,顽军突然向我茗山地区进攻,激战两小时后,我哨兵发现保安据点日伪军 100 余人跑步出发,妄图配合顽军夹击我军。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我军利用熟悉的有利地形,迅速转移,脱离险境。为了阻击顽军前进,我大鄂指挥部在铁山以南的张伏山、车桥、张克诚一带构筑工事。同时,将大鄂的战斗人员转移到鄂大根据地。这时,大鄂根据地日益缩小,干部战士都为失去根据地而情绪不安。大鄂指挥部及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了在樊湖的杨学诚同志。

杨学诚同志接到报告后,全面进行分析,认真作了回复。他在

信中说：“当前你们回旋余地极小，面临敌顽夹击，可把部队拉到樊湖。”并针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着重指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大鄂指挥部的同志接到这封信后，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对前途充满信心，迅即把部队撤至樊湖。就在大鄂指挥部撤至樊湖的当晚，杨学诚同志在柯家营迎接了他们，紧握岳林、李洛两同志的手，高兴地说：“我们胜利会合了！”他高度赞扬大鄂指挥部的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并指示大鄂工委，今后要以樊湖为依托，不断向大鄂中心区——谈家桥出击，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收复谈家桥失地。他说：“我这几天观察了鄂大、樊湖的地形，这里有山有水，港汊交错，便于游击，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工作也有较好的基础，群众抗日情绪高。只要我们加强领导，一定能把鄂大和樊湖建设好。”他还说：“要开辟鄂南，必须以江北为依托，鄂城沿江根据地是坚持鄂南抗日斗争的桥头堡！”

随后，杨学诚同志把这些看法向边区党委作了汇报，获得认可。边区党委根据他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相应的党政机构，统一指挥鄂南的抗日战争。

杨学诚同志在开辟鄂南期间，因受风寒侵袭，患了结核性肋膜炎，战争环境，工作繁忙，他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得不到休息和治疗，病情逐渐加剧。边区党委非常关心他的病况，千方百计搞药并派专门人员进行医护。但是，终因病情危重，在转移的途中，于1944年3月6日夜病逝在大悟山以北的高家洼，时年仅29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英名，将永远刻在鄂南人民的心中。